

戰國六書論

訂補

何琳儀著

戰國六家辭論

訂補

何琳儀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戰國文字通論：訂補/何琳儀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7

ISBN 978 - 7 - 5325 - 8253 - 2

I. ①戰… II. ①何… III. ①漢字—古文字學—研究—戰國時代 IV. ①H1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42832 號

戰國文字通論(訂補)

何琳儀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浙江临安曙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00×1000 1/16 印張 35.75 插頁 2 字數 513,000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100

ISBN 978 - 7 - 5325 - 8253 - 2

H · 166 定價：12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再序

李學勤

我應何琳儀教授之邀，為他的《戰國文字通論》一書的初版作序，時間是在 1987 年的冬天。這部專著於 1989 年由中華書局印行，很受學者們的歡迎。荏苒至今，不覺已經十多年了。

這期間，中國正經歷不平凡的變革，科學事業的各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中國古文字學，伴隨着考古工作的開展，成績也很彰著，而在古文字學的幾個分支裏，戰國文字研究的前進尤其突出。

學科的分文化，是其發展的一項重要標誌。例如現代的物理學，按照通行的《學科專業目錄》，就分為理論物理、粒子物理與原子核物理、原子與分子物理、等離子體物理、凝聚態物理、聲學、光學、無線電物理等分支。中國古文字學的發展史也是這樣，陸續形成了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簡帛研究等獨立的分支。戰國文字研究的興起是比較晚的，但其成為一種新的分支却相當快速，確定了自己的領域和方法，積累起自己的材料與文獻，隨之專門的學者隊伍也組織起來。

《戰國文字通論》的初版，對這一學科分支的早期成果做了綜合總結。因此，我在那時寫的序言中曾說，該書的出版，“在這一分支學科的成長過程中，是一件大事，必將促進學科的深入發展，有利於中國古文字學的進步”。

如果說戰國文字研究在當時還處於成長的階段，作為學科分支沒有為大家充分認識的話，在今天，這一學科分支可以說業已臻於成熟了。值得注意的是，戰國文字研究本身又在進一步分文化。

《戰國文字通論》已依據學者的研究成果，將戰國文字劃分為齊、燕、晉、楚、秦五系。這五系文字，都有專門的論作發表，但因為各系已發現材料數量並不均衡，有的系的研究進展特快，已顯露建立為分支的趨勢。

首先表現這種傾向的是秦文字。早自王國維先生，即以西土的秦文字與東土的六國古文相區別。近年有學者集中輯錄秦文字材料，雲夢睡虎地的秦簡也有文字編問世。日前傳來訊息，湖南龍山里耶新出秦簡，竟多達約兩萬支，這無疑會大為開拓我們對秦文字的眼界。

同樣重要而更需要研究精力的是楚文字。1933年發現的壽縣李三孤堆楚金文，1942年發現的長沙子彈庫楚帛書，20世紀50年代開始出土的楚竹簡，已使楚文字躍為學者論析的焦點。前些年新出的荊門郭店楚簡與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楚簡，更確立了楚文字的重要地位。今天研究六國文字，不得不先從楚文字入手。和秦文字得到重點研究一樣，楚文字研究也趨於專門化。

這一類徵象表明，戰國文字研究有很多新內涵，有待再加綜合總結。何琳儀教授在此時增訂再版他的《戰國文字通論》，正是適應了這樣的需要。

何琳儀教授一直在戰國文字研究的前沿辛勤工作。1998年，他出版了厚1600頁的《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這部巨作不妨說是戰國文字的一次普查，處處顯示出作者的深厚功底與敏銳識見。書內許多觀點，同《戰國文字通論》相通，讀者如能合觀，必能有左右逢源的感受。

2002年7月16日

序　　言

李學勤

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叙》，描述戰國時期“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清段玉裁注云，所謂“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即“各用其方俗語言；各用其私意省改之文字也。言語異聲則音韻岐，文字異形則體製惑，車同軌、書同文之盛於是乎變矣”。按子思著《中庸》，引孔子的話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是春秋晚期文字尚能維持大體一致，至戰國時歧異始形顯著，爲一大變。秦兼併六國，以秦文字爲標準，“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又爲一大變。由此看來，戰國文字在中國文字演變史上自成段落，應當專門加以研究。

北宋以來學者重視青銅器銘文，所指主要是商代晚期至春秋的文字。清末甲骨文發現，商代文字研究更爲興盛。戰國文字，由於材料繁多分散，且少長篇巨製，歷來不爲學者所重；加以戰國文字有其本身種種特點，雖有著作涉及，每每難於掌握其間規律，在釋讀上造成許多誤解，以訛傳訛，歷久不改。這不僅影響着對文字演變的通盤瞭解，而且對古代歷史文化的探索也有不小妨礙。戰國文字作爲系統研究的對象，是在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的，二十多年間發展迅速，迄今已形成中國古文字學的一個獨立分支。

戰國文字研究發展的標誌是：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已經有一批專心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員。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各屆年會都有戰國文字研究的論文提出。在研究生培養上，也有了以戰國文字研究作爲專業方向或者論文主題的。隨着近年田野考古工作的開展，新的戰國文字材料大

量出現，實際工作迫切要求有關研究成果的傳布普及。從各方面看，對戰國文字研究的豐富收穫進行總結綜合，現在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何琳儀同志這部《戰國文字通論》正好滿足了大家的希望和要求。

何琳儀同志從學於古文字學界前輩于省吾先生，取得學位後，在吉林大學講授戰國文字。他在古文字學方面有深厚基礎，因而論述戰國文字，能由古文字流變全局着眼。《通論》一書有兩點優長，是特別值得向讀者推薦的：

第一，是博採衆說，去取矜慎。如前所言，戰國文字材料本多瑣碎，考釋論著為數頗多，兩者都不便蒐集，讀者苦於難觀其全。《通論》篇幅雖屬有限，但已將各家成說盡可能搜羅在內，予以系統化。書中特別注意吸收學術界最新研究成果，包括一些剛剛發表的，也已收入融會。

吸收已有成果，貴在有所別擇。任何學科，尤其是像戰國文字研究這樣成形不久，正處在發展時期的分支學科，學者間難免有若干爭論，新說也必然有不能成立者。本書不狃於舊說，亦不惑於新義。例如幾年前我曾寫一小文，論及上海博物館收藏有江陵地名的戰國官璽，何琳儀同志取文中釋地部分，而芟除所釋未妥部分，甚為允當，值得感謝。

第二，是推陳出新，多有創見。本書雖然是一部“通論”，首先側重於綜述，而各章節中實含有作者精心研究的新獲，不少即在舉例之間，請讀者不要忽視。以下試選數例聊見一斑。

燕國長條形璽，多有匚字，前人多置不釋。或釋為匱，讀為節，亦嫌未妥。《通論》由於省吾先生釋甲骨文匚字出發，釋此字為匱，讀為符，是新穎的見解。此例一。

趙國相邦春平侯等鉸，刻銘有時有“左右伐器”之詞，舊多不識，或識之而不知所云。《通論》引《楚辭·天問》及注，指出“伐器”猶言兵器，解決了這一疑難。此例二。

江蘇盱眙南窖莊出土銅壺，曾經幾位學者討論，銘文釋讀逐漸明晰。其中有“重金某某”四字，後兩字就是“綰壺”，壺字之釋，是由於認為該字是器名，實不妥當。《通論》改釋為“綰襄”，可讀為“絡鑲”，與此器有鏤空銅絲網套及錯金、鑲嵌綠松石吻合。此例三。

河北平山出土中山王方壺，銘文有鑄，即絕字，字从刀作。《通論》引孔廣居《說文疑疑》說，指出前人預見這一點。此例四。

河南信陽長臺關出土楚簡，有“[相]附如會，相保如介”之語，《通論》說明附、會、保、介意義相關，如為連詞。按《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志殷如浚（深），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如字用法正與此同。此例五。

這五個例子不過是隨手拈來，書中還有許多新見解。各章所論戰國文字變化規律，更是富於啓示性，對讀者有很大幫助。

《戰國文字通論》的出版，在這一分支學科的成長過程中，是一件大事，必將促進學科的深入發展，有利於中國古文字學的進步。蒙琳儀同志叫我寫幾句話，我是極感欣幸的。所說容有不當，請琳儀同志和大家指正。

1987年11月

目 錄

再序	李學勤	001
序言	李學勤	001
第一章 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研究 001		
第一節 引言		001
第二節 古代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研究		003
第三節 近代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研究		009
第四節 現代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研究		015
第五節 戰國文字的分類		031
第六節 小結		042
第二章 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 044		
第一節 引言		044
第二節 簇文		045
第三節 《說文》古文		052
第四節 三體石經古文		067
第五節 《汗簡》和《古文四聲韻》古文		077
第六節 小結		090

第三章 戰國文字分域概述	092
第一節 引言	092
第二節 齊系文字	094
第三節 燕系文字	113
第四節 晉系文字	131
第五節 楚系文字	176
第六節 秦系文字	218
第七節 小結	247
第四章 戰國文字形體演變	251
第一節 引言	251
第二節 簡化	252
第三節 繁化	263
第四節 異化	276
第五節 同化	299
第六節 特殊符號	304
第七節 小結	317
第五章 戰國文字釋讀方法	319
第一節 引言	319
第二節 歷史比較	323
第三節 異域比較	328
第四節 同域比較	337
第五節 古文比較	343
第六節 諧聲分析	349
第七節 音義相諧	353

第八節 辭例推勘	359
第九節 語法分析	366
第十節 小結	369
 餘論	372
 引用書刊簡稱表	378
 後記(一)	383
 後記(二)	384
 附錄：論著目錄	386
大陸論著目錄	徐在國 386
港澳論著目錄	袁國華 532
臺灣論著目錄	季旭昇 539
國外論著目錄	徐在國 556
 出版後記	562

第一章 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研究

第一節 引　　言

漢語古文字，顧名思義是指記錄上古漢語的文字，通常特指包括小篆在內的先秦古文字（有些學者主張漢武帝以前的古隸也屬於古文字範疇）。近幾十年來，古文字學界都傾向於把漢語古文字分為殷商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和戰國文字三部分。我們認為，這種三段分期法基本能够反映三段歷史時期的文字發展演變過程。

戰國文字是漢語古文字的晚期書寫形式。從字體而言，戰國文字既包括筆畫圓轉的篆書，也包括筆畫方折的古隸；從書寫材料而言，戰國文字既包括金屬、石器、陶器、木器、漆器，也包括絲織品。僅就外在形式觀察，戰國文字就是一相當複雜的概念。因此，在介紹這種古文字之前首先必須搞清它的範疇。

戰國時期的下限，公認為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年，即公元前 221 年。戰國時期的上限則有公元前 481 年（上接《春秋》終年）、公元前 475 年（周元王元年）、公元前 468 年（周貞定王元年）、公元前 403 年（三家始封諸侯）等異說^①。

戰國文字的使用時間，一般說來應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相對應。然而，不同期古文字的分期絕不能如歷史年表那樣整齊劃一（何況上舉戰國始年

已在近 80 年間浮動),其形體也絕不會因改朝換代而發生突變。文字的變異總是按照自身的演進規律而發展變化。一般說來,這種發展變化都要經歷一段較長的漸變過程。殷代文字演變為西周文字,西周文字演變為春秋文字,春秋文字演變為戰國文字,都有其歷史、地域、人為諸方面的複雜因素。很難設想,一種古文字在某天早晨會變成另一種古文字。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採取中央集權的威力,罷黜六國古文,推行秦文字,是一場雷厲風行的文字革命,堪稱文字學史上僅見的文字“突變”。儘管如此,也不能把秦代小篆開始使用的時間限定為公元前 221 年。因為,前此不久秦國已出現了像新郪虎符那樣標準的小篆^②。而後此幾十年的秦漢竹簡帛書文字中也時常可以找到六國古文的影子^③。因此,機械地劃分戰國文字使用年代的上下限是不够妥當的。

其實,自春秋中期以來,列國文字已開始發生引人矚目的變異,其形體結構和書寫風格都逐漸失去西周文字的特點,而開啓戰國前期文字的先河。下面試舉若干春秋中期以後的金文,以之與戰國文字相互比較:

春秋中期以後	戰國時期
屯 卍 叔夷鑄	𠂇 陳純釜“純”
國 國 國差鑪	𠂇 《陶彙》3·1005
合 會 晉公蓋	𠂇 楠朝鼎
四 四 邶鐘	囗 大梁鼎
吉 吉 徐沈尹鉦	吉 《包山》204
乘 𣎵 鄧公乘鼎	𣎵 鄭君啓車節

不難發現二者筆畫結構一脈相承,呈現典型的晚周文字風格。至於春秋中期以降的楚系銘文,諸如王子嬰次爐、王子申蓋等,與戰國早期禽章諸器、曾侯乙諸器等風格類似,更是一目了然。而南方楚國,包括吳、越、蔡等國的銅器銘文中的花體字,其春戰之際的界限就更難以掌握了。因此,對戰國文字使用時間的上下限,乃至對一種字體的始末予以探討,只能求其概

數，而不宜強指其絕對年代。

基於這種認識，所謂“戰國文字”的上下限應是比較寬的。我們認為如春秋末年的侯馬盟書（或以為戰國初年）以及部分越國、蔡國銅器銘文，乃至年代頗有爭議的石鼓文，都可以與戰國文字對比研究。同理，秦統一後的若干銅器銘文和簡牘文字，也可以與戰國文字對比研究。至於時代不宜確指的貨幣、璽印、陶文等材料，我們也間或採用春秋戰國之際和秦統一以後者。這不僅便於文字學方面的比較研究，而且與文字形體“漸變”的規律也是並行不悖的。

總之，我們所討論的“戰國文字”材料並不十分嚴格地局限於歷史上的戰國時期，而間有闖入春秋末期和秦統一以後者。大體可以這樣說：古文字學中的所謂“戰國文字”，是指春秋末年至秦統一以前這段歷史時期內，齊、燕、韓、趙、魏、楚、秦等國曾使用過的一種古文字。戰國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中是上承春秋金文，下啓秦漢篆隸的重要環節。

下面就按古代、近代、現代的時間順序，介紹歷代戰國文字出土和研究的概況。

注釋：

- ① 楊寬《戰國史》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 ② 唐蘭《中國文字學》15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③ 李學勤《秦簡的古文字學考察》，引《雲夢秦簡研究》341頁，中華書局，1981年；又《新出簡帛與楚文化》，引《楚文化新探》39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第二節 古代戰國文字的 發現和研究

一、兩漢時期

戰國文字材料的首次發現應追溯到兩千年前的西漢前期。

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詔令廢除秦始皇時期頒行的“挾書律”，許

多秦火之餘的戰國古籍賴以保存下來。例如：河間人顏貞秘藏《孝經》、北平侯張蒼所獻《左傳》、河間獻王所得《周禮》等儒家典籍相繼發現。不過這一時期轟動一時而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的事件，當首推孔子壁中書的發現。

西漢景武之際，魯恭王在山東曲阜孔子故宅牆壁中意外地獲得一批珍貴的儒家典籍。這些典籍書寫於竹簡之上，其文字與當時通行的隸書迥然不同。後來稱這批典籍為“古文經”，其文字為“古文”。其實這是戰國文字的首次大規模發現，遺憾的是這一點有意無意地被人們忽視了。“古文經”出現後，立即遭到“今文經”學家的激烈反對。然而也有少數有識之士非常珍視這批新材料，並用以校正當時通行的“今文經”。例如：武帝時學者孔安國得古文《尚書》，則“以今文讀之”（《史記·儒林傳》），並“以今讎古，以隸篆推科斗”（《孔叢子·與從弟書》）。這顯然是具體而微地整理和研究古文字。孔安國研究古文《尚書》應是古代研究戰國文字的濫觴。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漢書·劉歆傳》），乃詔劉向“校中五經秘書”（《漢書·劉向傳》）。西漢末年，劉向之子劉歆繼父之業負責整理這批“古文”材料時，勢必也和孔安國一樣，對其文字進行釋讀和校理。所謂“釋讀”，是研究任何一種古文字的先行步驟，也是最基礎的工作。又據《論衡·正說》記載，漢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這也應是先秦“竹書”。延及東漢，研究“古文經”成為一代風氣。兩漢古文經學家多是古文字學家，如張敞、桑欽、爰禮、揚雄、杜林、衛宏、徐巡、賈逵、許慎等人，均為其中翹楚^①。這一時期，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東漢文字學大師許慎對戰國文字研究的功績。衆所周知，許慎《說文解字》的體例是“叙篆文，合以古籀”（《說文·叙》）。所謂“古籀”多是戰國文字的傳鈔材料，今天已成為釋讀出土戰國文字的重要依據（詳第二章）。另外，通過古文、籀文與戰國文字及其他傳鈔材料的比較，還可以豐富我們對戰國文字形、音、義諸方面的認識。下面試舉幾例說明：

1. 《說文》：“周，古文周，从古文及。”“及，古文及，秦刻石及如此。亦古文及。”關於“周”从“及”，以往學者多有疑惑^②。檢中山王圓壺銘之“周”作

“周”^③，中山國十四 鼎銘之“簡”作“𠂔”^④，《古文四聲韻》引《說文》“周”作“𠂔”。凡此證明戰國文字中的確有从“及”的“周”。當然，“周”何以从“及”，“及”何以省“又”作“人”形，尚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是，今後的研究方向應是用新出土的戰國文字印證許說，而不是否定或懷疑許說。

2. 《說文》：“匱，古文席，从石省。”“匱”即“酉”^⑤，乃“簾”之古文^⑥。“匱”之所从“厂”為形符，“匱”乃聲符。“厂”，“石”之省，可參九年衛鼎銘之“席”作“匱”，望山二號楚簡“席”作“𠂔”。《古文四聲韻》還保存着不省的“席”作“𦵹”。“席”从“石”得聲，聲韻均合。

3. 《說文》：“旣，古文伊，从古文死。”案，“旣”，从人，死聲。伊、死疊韻。望山一號楚簡之“死”作“旣”^⑦，與《說文》古文契合。

4. 《說文》：“旣，古文備。”戰國文字標準形體作“旣”（隨縣簡），其所从右旁乃“旛”之初文，象“箭”倒置箭袋之形。或作“旣”（中山王鼎），其箭杆訛作“女”形，古文遂訛作“旣”。子備戈作“旣”，可證此訛體亦淵源有自^⑧。

許慎對《說文》古籀的解釋當然未必盡確，有的結論還相當荒謬。例如：釋“爲”之古文“𠂔”字“象兩母猴相對形”，釋“省”之古文“旣”字“从少从匱”云云。然而通觀《說文》有關對古文、籀文的解釋，則不難看出許慎對這批不同於小篆的文字相當重視，並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他對古籀的形體分析，至今在研究戰國文字中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總之，兩漢是研究“古文”的鼎盛時期。古文經學家在研究“古文經”的同時，對其文字的形體也進行研討。他們研究的對象“古文”，其實就是戰國文字。可惜由於“古文經”的亡佚，有關著作都未能流傳下來（《說文》除外），今天已無從瞭解其研究的詳情。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

這一時期，魏石經的刊立和汲冢竹書的發現，最值得大書特書。

魏石經刊行於魏曹芳正始年間，所以又名魏正始石經，以區別於漢熹平

石經。魏石經碑文每字多載古文、篆文、隸書三種字體，所以也名三字石經或三體石經。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的形體十分接近，應是一個系統的文字（詳第二章第三節）。魏石經的刊立對“古文”的傳播和研究起過積極的作用。今天研究“古文”，除了《說文》古文之外，這批材料最為可靠。因此，石經古文也是釋讀戰國文字的重要參證之一。

這時出土的戰國文字材料以汲冢竹書最為顯赫。西晉武帝咸寧五年（公元279年），今河南汲縣民不準盜掘戰國魏王古墓所得竹簡凡75篇，其中包括《周易》、《紀年》、《穆天子傳》、《瑣語》等16種，約10餘萬言（《晉書·武帝紀》）。這是繼孔子壁中書之後又一次重大的考古發現。與壁中書不同，汲冢竹書發現之時即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太康二年（公元281年），詔令當時著名學者整理這批竹書，寫出“隸古定”釋文。所謂“隸古定”就是把戰國古文寫成今隸，這當然屬於古文字研究範疇，我們今天尚能看到的《古本竹書紀年》佚文和《穆天子傳》，即西晉學者荀勗、和嶠、摯虞、衛恒、束晳等人整理這批竹書的部分結晶。另外，衛恒在整理竹書時通過分析同字異形，歸納為數百條，撰《古文官書》一卷^⑨。續咸撰《汲冢古文釋》十卷。這些都是專門研究古文字的著作，可惜唐宋以後已蕩然無存。

汲冢竹書與三體石經也是同一系統的文字（詳第二章第三節）。西晉學者在整理汲冢竹書之時，已有40年前刊立的石經作為“隸古定”依據，顯然要方便得多。《穆天子傳》不到一年就整理完畢，其他竹書也於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全部編校寫定^⑩。杜預曾參考這批新出土的材料為《左傳》做注。凡此說明汲冢竹書的整理速度和研究成果都相當可觀，這與三體石經的刊立和流布不無關係。

但是也必須指出，《紀年》的體例比較接近石經中的《春秋》，用後者常用的文字與前者戰國古文參讀，其文字障礙不會太多（《紀年》也偶存古字，如“宋景公蠭”與宋公欒戈的“蠭”同形，《史記》則作“欒”）。然而《穆天子傳》所涉及的人名、地名、草木魚蟲、珍寶異器等文字則相當繁富，遠非石經古文所能囊括。今天能見到的《穆天子傳》雖是隸定本，然猶存古文。如“時”作“眚”（卷一），“壽”作“鬻”（卷二），“其”作“丌”（卷四），“乘”作“乘”（卷六）等，